当前美国核战略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马方方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摘要] 有核国家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利用核威慑推行以核武器为载体的核战略, 服务于一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世界头号核大国, 美国的核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支柱, 其发展趋势不仅与美国自身的安全密切相关, 更关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看, 当前美国核战略的调整与发展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 同时也不乏一定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核武器; 核威慑; 核战略; 国际安全

[中图分类号] E8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8)03-0041-06

一、核战略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分析

核武器是一种具有特殊毁灭能力的杀伤性武器, 自诞生以来便因其超强的威慑价值被有核国家作为一种战略武器加以控制和运用, "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对核威慑的运用, 是在国家政策与战略理论基础上, 受政治、军事、财政、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国家战略。它不仅是核国家逐渐成熟的标志, 也是其不可忽视的国家军事指南。"[1](P53)作为世界头号核大国, 美国自掌握核武器以来, 几乎历届政府都会提出其在核战略方面的战略设想, 同时其核战略安排之精当、谋划之深远, 诸大国无出其右。整个冷战期间, 核战略不仅被视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而且是与苏联相对抗的重要筹码, 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竞争对手的消失, 美国根据国际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威胁主要来源的转移, 对其传统核战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应调整, 但其调整后的战略地位非但未被削弱, 反而更加稳固和加强。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 美国的核战略并非仅由军方提出和制定, 其决策权掌握在美国最高当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手中。这是因为核战略不仅直接关乎美国国家利益, 而且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支柱地位。

一方面, 核战略在美国维护其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的战略谋划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最后一个超级大国", [2](P154)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强烈的全球性。用尼克松的话说: "在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及意识形态相互依赖的世界上, 任何地方发生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我们国内的安全。从全球性挑战旁边走开将付出危险的代价。"[3](P33)由此可见, 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性就决定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运用超强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优势, 建立美国一家主宰、遏制所有竞争对手、把美国价值观强加于全世界的单极世界。这也就决定了在政策与战略谋划层面, 美国将通过不断调整核战略、强化核威慑以追求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 以防止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的出现。

另一方面, 从美国战后所公布的军事和核战略文件来看, 核战略也一直被视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手段。尽管世界形势与国际战略格局因冷战的结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并未削弱核战略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存在的价值。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约翰沙利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卡。什维利指出:“美国的战略核威慑及其防御能力,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可以这样认为,美国核战略的制定与延续是建立在它对安全要求的分析上的——后冷战时期核安全问题涉及的领域是全方位的,包括核军控与裁军、防核扩散、防核意外、防核恐怖及战略稳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安全均突出了一个“防”字,也突显了战略谋划在美国核安全中的特殊作用,换言之,美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核安全离不开核战略。具体原因可以归纳为:“(1)虽然精确打击武器能够取代核打击,但这种替代是有限的;(2)作为确保对敌本土摧毁不可替代的手段,核武器将继续对军事行动尤其是战略打击起遏制作用;(3)核武器虽然相较于非核武器在技术上比较粗糙,但它仍然是一种“非常便宜”的武器;(4)资源的限制可能使一些国家采用按比例使用高技术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打击方法。”[4](P20)美国 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核态势也大大增强了我们在和平时期慑止侵略的能力。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的安全环境中,美国核力量的首要作用,是慑止对美国、对其海外部队、对其盟友的侵略。”[5](P25)显而易见,核威慑及核战略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二、当前美国核战略的发展趋势分析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核战略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与变革。但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不断调整,以及科技革命和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可以预见:调整远未结束。

(一)核战略重心将继续向第三世界地区性强国转移

冷战结束后,随着华约组织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战略上处于极有力的地位,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向美国挑战的实力。但是,原苏联解体后的不稳定性及地区性争端和冲突逐步成为世界不稳定的根源。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区的领土、资源、种族、民族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也由过去的潜伏状态开始表面化。在美国看来,这将给某些有野心的地区强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称霸的可乘之机,构成了对其国家安全的新威胁。根据对上述形势的分析判断,美国政府提出:有必要将美国核战略的重心向第三世界地区性强国转移:“将主要对苏联进行核威慑转变为多方位核威慑,即转变为既对原苏联地区进行核威慑,也对拥有或可能拥有核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核威慑。”[6](P54)也就是说,在冷战时期,美国始终将遏制苏联对美国的核攻击作为核战略的重心,不认为第三世界是威胁,认为后者只需服从国际规则,不谋求和使用核武器或其他非常规武器就构不成对美国的威胁,因而也没有必要动用核力量对付或威慑它。而在苏联解体后的后冷战时代,美国认为自己一方面要防备核实力仍然很强大的俄罗斯,另一方面还要对拥有或可能拥有核、生物、化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核威慑。显而易见,美国核战略的重心已由冷战时期的前苏联转移到了后冷战时期的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局势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以追求全球核武霸权地位为目标的美国,这一发展态势仍将继续。

(二)制止 WMD的扩散和使用仍将是美国核战略的重点之一

2002年 12月 11日,美国白宫向国会提交《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以政府文件形式正式宣布:“如果美国遭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袭击,将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压倒性力量’进行报复。”[7](P47)作为美国首次针对 WMD制订的专项战略,它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制止 WMD的扩散和使用仍将是美国核战略的重点之一。

这一方面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从克林顿执政的后半期开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运载工具的扩散开始被美国政府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最直接和最紧迫的“不对称性威胁”。与此相应,克林顿政府适时提出了“反扩散”的概念并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得以大规模应用。所谓“反扩散”,是指“美国国防部全面参与美国同扩散作斗争的活动,包括外交、军控、出口控制、情报收集与分析,特别是美国在面临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导弹的对手的对抗时担负起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武装力量的责任”。[8](P108)作为对反扩散的深化和应用,小布什反击 WMD战略的出台则明确提出,“美国一旦受到 WMD进攻的威胁,将使用包括核打击在内的一切手段先下手为强,”表明美国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的意图更加明确,小布什政府事实上已经抛弃了 50多年来的威慑与遏制政策。[9](P26)

另一方面,“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被小布什政府认为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遂将反扩散与反恐相结合,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反扩散的政策主张。制止 WMD的扩散与使用已然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其中近年的朝核危机与伊朗核危机的爆发虽然有美国霸权主义因素的作用,但亦是美国利用国际机制加大防扩散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力度的表现。总之，除了加强自身的核打击能力外，反扩散在美国的核战略规划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三）继续加大研制和开发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力度

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随着国际格局变化、美国军事技术发展、美国对于其国家安全认知的变化以及美国整体核战略的调整，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有了很大的完善与发展。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在反导技术领域和法律程序上皆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并逐步进入实质性的部署准备阶段。这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保持其霸主地位、追求国家绝对安全的结果。众所周知，谋取战略优势是美国长期的既定国策，为获取后冷战时代攻防兼备的军事优势，美国必然加快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步伐："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认定，除了传统的蓄意攻击、意外、错误和非授权发射等威胁外，美国正在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和非对称战争的挑战。由于某些"无赖国家"正在发展核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技术的继续扩散，给美国领土、美国的海外部队以及美国的盟友带来了巨大的威胁，"[10](P45)在此情势下，美国认为只有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并尽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才能对付此一系列威胁，进而保证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即通过"结合使用导弹防御系统与其他防御和进攻手段，将能够保护美国的行动自由权，增强拒止性威慑，并在一旦威慑失败后减轻受攻击的后果。"[11](P41)

显而易见，美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真正目的并非是防御，而是确保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自由，在保证国家绝对安全的同时，又可以威胁任何敌人。弹道防御计划的研制与开发可以说是美国力求巩固其全球"霸权体系"，推行全球霸权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从美国当前实力的优势地位以及所推行的维护霸权的鲜明政策意图来看，其研制与开发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以巩固美国在核战略力量上的优势地位。

（四）继续推进新军事技术革命进程，力保美国绝对核优势地位

在冷战后美国核战略调整的过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美国正在积极推进新军事技术革命的进程，力图加紧研制和发展适应信息时代军事斗争需要的新一代武器系统，以保证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美国的核优势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新一代美国武器系统的技术含量和设计形式对当代与未来战争的理解和适应性会更强，其中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是美国高科技实力的重要代表。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在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所作的《2000年度国防报告》中所指出的："未来的美国军事技术革命中，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占据重要地位，是代表新一代美军装备革命的'领头者'"。[12](P65)因此，随着美国对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力度的加大，其新军事技术革命的进程也必将随之加速，据欧盟估计，"到2010年，美国军事技术革命将会完成。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作战行动能力将比现在上一个更高的技术台阶，美国也将会进一步拉大同欧盟国家在军事作战能力上的距离。"这恰恰说明了美国推进新军事技术革命的原因之所在。

三、当前美国核战略的发展趋势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毫无疑问，作为当今世界上超级核大国的美国，其核战略在冷战后时代的调整及发展趋势必将给国际安全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冲击。总体而言，当前美国核战略的发展趋势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动摇了国际社会现有的战略核稳定体系

冷战后美国核战略的调整标志着其核战略力量配置的重大变化，不仅严重毒化了国际社会的政治气氛，而且打破了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所形成的核战略稳定体系，这主要表现在其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给国际安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上。一方面，美国对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标志着其核防御力量的大大加强，进而引发了大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大调整。正如美国学者查尔斯·L·格拉塞和史蒂文·费特所指出的那样："NMD的特殊性就在于其不可避免地把美国的战略核政策与俄罗斯、中国联系在一起，并影响美国与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10](P40)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正是通过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消除其他有核国家核威慑能力，进而获得自身的绝对安全。但由于许多有核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也建立在核威慑的等效性基础之上，一旦失去核威慑能力，其国家安全势必受到威胁，因此其核战略和军事战略必然随之进行重大调整，进而直接影响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宁。另一方面，以导弹防御系统为代表的美国全领土战略防御体系的出现从根本上打破了冷战时期所形成的全球核攻防力量的战略平衡。如基辛格博士所言，"在核武器数量足以毁灭对方乃至整个地球数十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核大战，核打击精度的意义已经不重要了。由于核武器的极大毁灭性，核战争使双方的胜利失去了意义，核打击使双方的社会秩序陷入瘫痪，胜利者也是失败者。"[13](P21)正是由于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能是双方都不能接受的，才使人类在半个多世纪里避免了核战争。但是，导弹防御系统的出现使得这样一种现实成为可能：即美国可以打击其他核国家而无需担心本国会受到该国的核报复，核战争已不再是“死亡游戏”。全球核攻防力量的战略平衡被完全打破，核战争爆发的可能系数增大。

2.阻碍了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

纵观国际军控与裁军的发展历程，其在冷战结束前后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军控与裁军领域是以双方核力量对比为基础的，保持核均势不仅是国际军控与裁军的战略基础，更是美国整个核战略的基石。但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宰着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同冷战时期美国在核军控与战略调整领域与苏联的合作相比，在整个冷战后时代美国对其核战略的调整皆带有单边主义的色彩，无所顾忌地我行我素，进而对整个的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到公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抛弃了几十年来作为国际军控与裁军基石的战略稳定性，使国际军控与裁军失去了原有的控制规则，而变成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同时，由于美国在其新核战略里公然提出将对一些国家，甚至包括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无疑将推动这些国家加快研制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步伐，以尽快对美国形成并保持有限的威胁。如此以来，多边领域的军备控制，特别是核军控将面临严重危机。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有核国家有限的战略威慑力量是无法与美国相匹敌的，而处于独一无二的核优势地位的美国更是不会主动放弃其在军控领域内的单边主义行为，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将不时受阻，甚至停滞不前。

3.加剧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导弹技术的扩散

为建立“新三位一体”的新核战略，美国不惜退出反导条约，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拒签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积极准备核试验，这必将加剧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导弹技术的扩散。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核技术的和平利用，许多非核国家已经掌握了研制核武器的技术基础，只是由于核不扩散与核禁试条约的限制，才无法进行核试验。但美国核战略的调整，率先破坏了国际军控和核裁军进程，使他们有了研制核武器的借口，从而增加了核扩散的现实威胁。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核战略的调整过程中赋予了核武器新的任务，提出应该准备核武器应对包括“阿以冲突、台海战争、伊拉克对以色列及其邻国的攻击和朝鲜对韩国的袭击”各种地区性安全危机，同时可在必要情况下对七个国家施以核打击：俄罗斯、中国、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很显然，这其中除了中、俄两国外其他国家都是核不扩散签约国中的无核国家。为了对付来自美国方面的核威胁，这些国家在没有实力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情势下，则可能更加重视对费用相对较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系统的获取，某种程度上这又拓宽了国际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的渠道，进而导致新一轮的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导弹技术的扩散的出现。

4.诱使冷战后核危机的频频爆发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频频爆发核危机，从印巴核竞赛到朝鲜核问题再到伊朗核危机，国际核形势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除了历史原因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本身的缺陷之外，美国核战略的调整与逆转可谓难辞其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这首先体现在美国的核不扩散目标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宗旨并非完全一致，在某些方面甚至背道而驰，使得核不扩散机制带上了浓厚的冷战色彩，进而导致了核危机的频频爆发。在选择防扩散战略目标方面，美国越来越强调目标国家的政权性质。如美国明确指出像朝鲜、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对美怀有深刻敌意的国家，是其核打击的重点。美国200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更是从冷战思维出发，将朝鲜、伊朗等国列入其核打击目标，导致这些国家对美所谓的“反扩散”战略极度反感，并为应对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纷纷启动核计划，从而引发了一连串核危机。其次，在地区核政策方面，美国实施双重标准。譬如，美对其盟国日本的核材料积累熟视无睹，对其传统盟友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秘密活动非但不反对，甚至以受到威胁为由为其辩护。正如美国官员所言，“美国不声不响却心甘情愿地充当了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的合伙人”。[14](P.92)而对于那些敌对国家的核扩散行为，美国则一律严厉制止或打击，甚至不惜以莫须有之名发动战争。近来，美国在核问题上对印度和伊朗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再次表明了其核政策的双重标准。很显然，这一标准大大刺激了美国的敌对国家核武器的发展，奠定了核危机爆发的事实基础。此外，美国在其核战略的调整过程中还推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核种族主义隔离”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美国既长期坚持核威慑政策，又反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其不友好国家拥有核武器”。[15](P.46)显而易见，正是由于美国核战略调整过程中的实用主义政策以及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才导致一些国家对其自身安全系数表示忧虑，发展核武器、成为核国家的欲望日益强烈，从而加剧了核危机的爆发。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正如唯物主义辩证法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集合体，都存在正反两方面的要素特征，须辩证地分析看待。换言之，美国核战略的调整和演变也给国际安全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影响：

第一，尽管美国的核战略调整发展的首要考虑是自身的安全，但是由于在国际社会强调并采取了一系列“防扩散”举措，在客观上有遏制后冷战时期“核俱乐部”成员骤增的作用。

冷战后初期，世界范围内的核扩散形势一度十分严峻。苏联解体不仅使一个核武器超级大国顷刻间变成了 4个核武器国家，而且由于这些国家的内部动荡，导致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核材料、核技术与核专家呈现出进一步扩散的趋势，地区冲突的刺激和谋求地区霸权的企图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谋求发展并拥有核武器。与此同时，国际上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频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使得一些激进的非国家行为体，如极端的民族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组织也在趁机觊觎核武器。这种增大的核扩散危险使得国际社会防核扩散的任务异常艰巨，美国也视其为对美国安全最直接和最紧迫的“不对称性威胁”。2000年底，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报告《扩散：威胁与回应》明确指出：美国“无可匹敌的优势促使对手寻求非常规的、不对称的手段来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我们的致命的弱点。”在此情势下，美国加强了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与其他有核国家的协调，在其推动下，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防止核扩散体系也得以不断完善与发展。国际原子能机构、导弹及其技术控制机制、核供应国集团等组织系统分别从不同角度担负起了防止核扩散的重任。同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关于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附加议定书》、《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准则》等一系列约束机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尽管这些组织机制在相当大程度上为美国所主导，但毫无疑问地它也发挥着独特的“领头羊”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组织机制增强了防核扩散的手段，壮大了防核扩散的力量，不仅有利于今后更有效地开展防核扩散的斗争，某种程度上也沉重打击了各类无核国际行为体谋取核武器的野心与决心，阻止了“核俱乐部”成员的骤增。

第二，在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社会里，强化绝对的核威慑效应有利于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和既存集体安全机制的维护。

国际关系的现实表明，“国际机制的制定与诠释权显然是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国际机制的修改和完善也只有在得到大国的认可之后才转化为现实。”[16](P395)很显然，作为当前国际机制的制定者和维持者，只有有实力的大国才能主导、支配、整合和调节国际机制的运行与发展。在二战和冷战后形成的国际集体安全机制中，美国无疑是拥有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国家。冷战后至今，美国的核战略调整和变革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是密切相联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现有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运转与维护离不开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调整及其与美国霸权作用的发挥。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新的核战略的目的一是追求核威慑效应的最大化，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防扩散，在维护其核武霸权的同时，也遏制了国际安全领域内的一些消极行为，有益于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正常运转。

四、结论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核战略一直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调整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国际安全形势的演变，另一方面来自历届美国政府政策目标的变化，但从整体来看，冷战后美国核战略的调整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每一时期的核战略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适应美国国家政策与政治战略的需要，通过理论认证和内部辩论而成为美国国家战略并走向国际舞台的，进而实现争夺世界霸权的既定战略目标。由于美国的国家定位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美国核战略的修正和完善势必给国际社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建立一个长期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通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共识的前提下，美国核战略的加强与完善无疑是背道而驰的，给国际安全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它不仅打破了国际社会几十年来的战略核稳定体系，在阻碍了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的同时，也有可能加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导弹技术的扩散，诱引冷战后核危机的频频爆发。不过，从客观上分析，尽管美国核战略调整的根本动机在于护持其核武霸权，但其“防扩散”的战略举措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阻止了后冷战时期“核俱乐部”成员的骤增，而其超强的核威慑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维持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集体安全机制，说到底，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对于当代世界的影响依然是举足轻重的。

总之，国际安全形势仍在变，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仍在不断调整，科技革命和新军事革命仍在向更加深度和广度的空间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美国核战略的调整远未结束，而且必将是一个与核武器同存亡的长期的历史过程。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考文献]

[1] 潘锐.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J].太平洋学报,2002年(3).

[2] Richard Nixon. Beyond Peace[R]. Random House, 1994.

[3] Richard Nixon. Seize the Moment: America's Challenge in a One Superpower World[Z]. Simon & Schuster, 1992.

[4] 周名南.冷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J].当代军事学术,2001(2).

[5] 姚云竹.克林顿政府200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述评[J].外国军事学术,2000(4).

[6] 徐华炳.浅评美国核威慑战略的演变与走向[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6).

[7] 杨文静.美国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浅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3(1).

[8] 吴大辉.防范与合作:苏联解体后的俄美核安全关系(1991—200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9] Mike Allen, Barton Gellman. Preemptive Strikes Part of Strategy, Officials Say "All Options" Open for Countering Unconventional Arms[J]. The Washington Post, 2002(A26).

[10] Charles L. Glaser, Steve Fetter.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nd the Future of U.S. Nuclear Weapons Policy(Vol.26)[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1(1).

[11] 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M].军事科学院.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12] William Cohen. 2000 Annual Report of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USA[R]. Chapter 6.

[13] [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

[14] 朱明权.核不扩散:危险与防止[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

[15] 沈文辉.朝核危机的外因探析[J].国际政治,2005(3).

[16] 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齐琳)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